



儒学与中国大学精神

(2005-6-28 15:37:53)

作者：郭齐家 储朝晖

摘要：中国近现代大学无一例外地显示出其精神带有儒学印迹，深入的历史研究表明，儒学是中国大学精神的根基，是孕育中国大学精神的重要学派之一，是中国大学精神变革的基础与背景，是中国大学精神形态与内容的内核，是中国大学之道的逻辑支撑。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儒学是中国大学精神变迁的主轴，儒学塑造出中国大学精神的主要特征：确立“士”的典范，倡导的“德治”，强调的“做人”，追求“合一”。

关键词：儒学；中国大学精神；根基；变迁；特征

大学精神是关于大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在大学设置与运行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可具体体现为：大学人的价值观、大学整体的理想和目标、大学核心理念以及大学组织信念。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大学精神的根源、中心、出发点、归宿，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对中国大学精神的产生、演变及其特征都发生着重要影响。

一、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儒学印迹

近代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的精神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特征，从中都可以找到儒学的印迹，季羨林先生认为北大精神是中国“士”的精神传承：

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才使北大人始终处在对国家民族、社会大众的极度关注当中。这种传统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发端，到明清之际演变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格言，最后在清季中国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便集中到了有千年太学传统的京师大学堂，这里集聚的正是最后一代的具有士大夫情结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具备了文化传承的能力，也义无反顾地担起了社会进步的责任；因此，百年来的北大不但创造了极为灿烂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也走在了历次爱国运动的最前列，影响最大的是五四运动，它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期实现振兴国家的目的。所以，北大的百年历程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在无数的北大师生身上也正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即他们不但承担起文化创造传承的分内之职责，同时也承担了民族价值认同的分外职责。

季先生用“士”的精神来表述北大精神，显出他对北大精神的历史洞悉，当年蔡元培反复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蔡元培解释兼容并包时常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显然是受儒学影响所致。

同样，清华大学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精神也为儒学影响所致。

梁启超1914年11月来清华演说中以君子为论题，以中国及英美君子之义“颇难得其确解”为背景，提出“周易六十四卦，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钩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又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一暴十寒之弊。……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继言“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

有人对开创清华黄金时代的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研究后认为，除了他多年的实践，他的思想“还有三个理论来源，即中国古代儒家大学（Great Learning）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欧美近代民主与法治思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欧美近世高等学府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他对儒家处世哲学，心领神会；又笃信基督，融会贯通，身体力行，而形成他独特的人格”。“梅贻琦认为，近代大学教育的宗旨，归根到底仍应是儒家《大学》里所说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以至清华的学生宿舍也被命名为“明斋”、“新斋”、“善斋”。

南开精神也体现的是以中国传统为本。如提倡社会本位的“公”而不提倡个体本位的“个性发展”；提倡中国文化传

统的勤俭而没有提倡西方文化所倡导的消费；提倡“土货化”而非提倡“西洋化”等等，只是在强调“能”、实干、协作等方面吸纳了欧美文化的优点。

西南联大精神更具有浓厚的“明道救世”、“士志于道”传统。陈岱孙有过一段陈述：

我们不得不把这成果归功于同学的求知欲望和教职员的敬业精神。而这二者实根植于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双方共同信念和责任感。其一，为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尽管，在这抗战八年期间，前方战事有时遭到挫折，但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是绝不动摇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终究要“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其次是联大师生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责任感。联大预测到，胜利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国家此时将需要一大批各方面的建国人才。“中兴业，须人杰”，责无旁贷，我们要承担起提供这人才的重任。

这二者：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由此，有人将联大的精神的源头归于民族精神中的一种浩气，认为它“是一种充溢的内在的浩气在警惕在策励联大的师生要去完成一个任务。这种充溢的浩气，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它恰像西方苦行修道的精神。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文化真正值得推崇的地方，便是这种精神，和对于这种精神的能够吸收和发扬”。

此外，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倡导“求是”精神从另一条路径体现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所谓求是，不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简言之，近代中国各个大学的精神都与那个时代的救亡图存密切相关，带有“明道救世”特征、对世事批判和审视的视角、尊道抑势的心态，中国人所办的大学且不说，外国教会所办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也都成为“双重文化（bicultural）”大学，“尽管沪江这类教会大学中有不少学生毕业后赴美留学深造，但他们普遍怀抱‘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力图把所学得的科学文化知识用于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些都足以说明儒学对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影响之深。

二、儒学为中国大学精神之根

儒学与中国大学精神的关系究竟有多长，有多深？历史事实表明：

首先，儒学是孕育中国大学精神的重要学派之一

大学精神有一个久远的存在和发展历程，不可否认柏拉图开办堪称现代大学先声的学园对现代大学所发生的精神影响，也不可否认公元前6世纪中国思想家老子和孔子在现代大学中的精神作用，正如同蔡元培所言：“在西历纪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间，中国已有尚无为、描写理想国之老子；建设伦理学、政治学之孔子，倡导民权论之孟子，建设伦理学之荀子，主张兼爱、尚同而又建设物理学、工程术之墨子，于相对世界中推想绝对世界之庄子。”也正如梅贻琦先生当年所识：“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

其二，儒学始终是中国大学精神变革的基础与背景

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是不断积淀与认同的过程，其主体“士”“始于孔、墨学派的建立，而终于秦代的统一”，他们乘“礼坏乐崩”之机，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实现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首次“哲学的突破”。从此他们“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且“先秦诸子学派无论思想怎样不同，但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一如儒墨“所言之‘道’不同，而所表现‘士志于道’的精神则一。”“士”一直都受儒学的影响：

“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的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是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士”又可更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这一时代的“高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此时的中国是处于孔子救不得、唯佛陀救得的局面；“教化”的大任已从儒家转入释氏的手中了。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此后“士”的新标准。这一新风范不仅是原始儒教的复苏，而且也涵摄了佛教的积极精神，北宋云门宗的一位禅师说：“一切圣贤，出生入死，成就无边众生行。愿不满，不名满足。”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我们还能在他的“世界有穷愿无尽”的诗句中感到这一精神的跃动。

[\[关闭窗口\]](#)